

寒露过后的第二天，应邀飞赴久违了的山城重庆，即将在这里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亚洲文化论坛——10+3主题会议”在等待着我们。既是山城，又是水城，如今又是“红歌”的重庆，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确乎是有点儿久违了。最后一次造访好像是1998年吧，参加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学术研讨会”。选择的时间也是天高气爽的深秋。会间朋友们结伴去大足观摩那些始建于唐宋初的石窟艺术，为的是探寻巴渝文化的源流和根脉。

积250年而终成大气的摩崖造像，使这座近50年来习惯于以“红岩”为文化标志的城市，显现出浓重而悠远的历史沧桑感。有人说，大足石刻无疑是巴渝文化史上耸起的一座丰碑，从它每一刀、每一凿的痕迹里，似乎可以窥视到巴渝文化千百年来发展的脉络。那铜梁龙舞、黔江摆手舞、小河锣鼓、川江号子、巴渝吹打（接龙吹打、金桥吹打）、秀山花灯、九龙楹联和口述故事、梁平三绝（灯戏、竹帘、年画），似乎都可以在大足石刻里依稀找到历史的踪影。须知，一座世界性的名城，有没有炫人的历史和悠久的传统是大不相同的。

自江北机场的现代化候机楼出来，登上接机的汽车，由北而南，逶迤到达离嘉陵江不远的君豪大酒店，几乎穿过了整个重庆市区。史上有言，重庆的九龙坡曾经一度是巴国的都城之所在。记忆中的那些显示着古代巴人依山临水而居的文化传统，那些负载着沉重历史的老民居，那些纵横交错的石板街巷，那些层叠蜿蜒的山路，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而车窗外闪过的，变幻成了一栋栋、一排排新建的显示着现代意味的高楼大厦。我的心，既为那些老街道老房子的消失感到惋惜，又为那些像积木似直指天宇的楼宇感到惊诧。这让我意识到，眼前的景象，是一个现代化快车道上的重庆。

从酒店的窗口向远处眺望，希望搜寻到我记忆中的那些并不连贯的重庆的印象碎片。不远处不就是滔滔东去与长

■ 记忆

柴达木的酒让我怀念永远

□ 刘元举

参加完第八届作代会刚刚回到南方，就接到了李玉真的短信。这个短信发来时我没有及时看到，或许是因为它带着太多的悲恸，太过沉重，一直沉到夜深人静时，我才突然看到。于是，这个骤然降温的夜晚，便带着凄凉的风声，在我面前铺开了无尽的悲伤。

此前，曾看到龙应台的北大演讲，她强调了“土”的作用。好像是易中天当面问她是不是“土”，她有几分女性的矜持说她自己不好评价自己，于是易先生便自问自答而且很肯定地说你就是“土”！土的含义很高远，不仅这个词距我们远，即使龙先生赋予这个字的含义也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比较生疏了。我们几乎很少能够看到“土”了。我们的目光集中到了显赫与辉煌上面，却有谁会关注“土”的风范？其实，土，在我理解中，应该与义相随，即“义士”。古代时，真义士大有人在，正是这种真义士令小人“常戚戚”而无法坦荡荡。然而，社会进化到了今天，在什么都以金钱量化的时候，义士不见了。义士还不是勇士，勇士可能呈一时之豪勇，而义士则是为了平生的理想目标而执著前行。肖复华与他的柴达木作家们正是这样的人。

在那个叫作七里镇的地方，我以城里人的陌生与矜持，接近着那些文化人。这些人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肖复华。他一见面前就不让我有陌生感，他视我如兄弟。这些年头儿，酒桌上称兄道弟比比皆是，而醉酒失言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头一回被肖复华拉到家里喝酒的场面，令我久久不忘，即使那是1995年，已经过去16年了，但那个夜晚，肖复华跟我所畅饮的那一幕，却让我刻骨铭心。那是柴达木的酒啊，由柴达木人掌管。他不是在跟你拼酒，也不是借由子多贪杯，他是自然地流露着柴达木人的真性情。他见我不能喝，便让我少喝点儿，而他却举杯频频，喝了差不多一瓶时，他的妻子周宏出面干涉了：你看你，人家都不喝了，你却一杯接一杯地干，你太过分啦。这个时候，我感觉无比尴尬。于是，我说我喝！我很惭愧，在人家那么认真地为你备了好酒好菜，那么真诚地与你同饮，而你却以城里人的方式矜持着，不肯敞怀畅饮，将自己的门关闭着，即使面对豪放的酒宴也不肯敞开，而人家却不挑你，即便因此被太太骂了，也不悔，这真的令我生感慨。都说文如其人，酒亦如其人。日后读到复华的纪实作品，每一句都是真诚的书写，绝不敷衍。如同举杯临风，那份豪爽豪迈无今无古，非义士不可达此境界。

我确实不喜欢饮酒，尤其这几年到了南方更是不善酒宴。常常在酒桌上被人家说我不像东北人。应酬式喝酒，喝得再多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忆的，而在柴达木的那个酒夜，却让我永远不忘。肖复华的善解人意、厚道、豪爽、坦荡，在当今尘世上再也无法找寻。他希望你高兴，而不是希望你多喝，你酒量大小没有关系，他只是要让你放弃陌生感，找到一份慰藉。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来柴达木，举目无亲，却在他这里找到了久违的亲情之感。以后，我一直想去复华那里再喝一次酒，我想主动地表现一下东北人的豪爽之气，我想跟他坦坦荡荡地开怀畅饮一次，以补遗憾。人生不是难得一次醉嘛。为真义士而醉，醉出一种感觉一种境界，值！

然而，我终于没有如愿以偿。因为我听说复华患病了，把酒给戒了烟也戒了。我知道，他虽然生于北京，但当年那首“头戴钢盔走天涯”的歌已经将他的青春及一生都交给了那条石油人的天涯之路了，他回到北京，哪里有人关心他买菜是否被宰秤？哪里能够一出门就遇到一片尊称：肖老师好！肖老师上班啊？肖老师吃饭了吗？大首都会让从大漠回来的义士，无所适从的啊！为什么他这么快就会患病？为什么他赖以生存的酒与烟会永远戒掉？多次想去看望他，想起那次柴达木的酒宴，一直念念不忘。我想，再见到他时，他不能喝酒了，也不能吸烟了，那么，我们坐到一起，他会多么失落？英雄落寞的情景令我不忍。或许，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我一次次去北京，却一次也没有能够再踏进复华的家门。倒是周宏有好几次打电话，说，到我们家来吧，肖复华常念叨你！我每次都说好的，我一定去。

其实，即使不与之对饮，与之回顾一下柴达木的青春与人生什么的，岂不也快哉！

倒是与肖复兴有过多次的接触。那一年我们一起来到了东莞采风，在一起待了十几天。去年6月份，我们又一次相聚在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工作营。复兴也是性格开朗的人，也很善谈，爱笑，笑起来眼睛眯缝，眯出许多智慧与幽默。我每每与之见面时，总不免要打听一下复华。复华似乎成了我与肖复兴交往的必要过渡。然而，见到复兴并不像见到复华时的感觉，那种感觉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那么毫无保留。

我常常会想，他们兄弟有着如此不同的个性，却有着共同的文学之梦、理想之梦，他们都是那种善于用功夫写作，也善于用真心交友的人，只不过兄弟俩彼此走的道路不同而已。环境改变着人的性情。兄长一直在城市里生活，在文化人圈子里生活，而弟弟却在大漠孤烟中头戴铝盔，步履艰辛地行走在沙尘暴遮天蔽日的花土沟，奔波在几天都见不到一点生命气息的茫硝原，还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墓地——冷湖，那里埋了那么多有理想的魂灵，却为大漠风沙搅得四季不宁！那里令我惊悚，连纪念碑的基座都被拆坏。而墓地的围墙只有短短一段，何时才能围拢？

一茬茬的石油人退休了，他们回到了故乡，他们寻到了久违的亲人，然而，他们告别了那片被青春汗水泡熟泡透的环境，开始了重新的尝试。能否适应新的城市？能否适应新的人群？那本应属于他们的城市，却在他们退休之后距他们越来越远。没有了酒，没有了豪饮，他们怎么适应？怎么欢乐欢畅？我想象着复华，在城市的安逸日子里，那颗放达出去好几十年的奔腾的心，会有着怎样的困守与迷惑。

真遗憾，这个世界再难喝到那样的柴达木之酒，再难寻觅到那种一见如故毫不设防的朋友！

柴达木的酒啊，让我怀念永远。

■ 土地与生长

寻找记忆碎片

□ 刘锡诚

江汇合的嘉陵江吗？记得多年前青年女作家包川陪同我到川南的珙县、宜宾去考察巴人（或是僰人）的岩画和悬棺，曾来到重庆，到朝天门码头，到她童年时生活过的老屋、街巷和邻居家中参观。她的旧居就坐落在两江汇合处的高高的崖畔上。可以在雄伟江水和船舶的崖畔平坝上，在江边的几十级水泥台阶上，我们遥望着两条颜色不同的江水如何汇合在了一起。在那一带，我头一次近距离地了解了普通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棒棒军坚韧不拔的耐力，重庆妇女们的勤劳，也聆听了这位女作家动情地讲述她的家道变故以及衰落，她那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的跌宕命运和凄婉故事。

回顾我对重庆文化的知识和印象，大半来自于两个途径：一是抗战时期麇集于陪都的人文学者和作家们的文字，特别是那些民族学家们的调查，如卫聚贤主办的《说文月刊》和顾颉刚主办的《风物志集刊》《文史杂志》周围的那些人文学者；二是全国解放后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和长篇小说《红岩》。研读抗战时期的那些文化与学术著作，使我对以重庆为代表的巴渝文化及其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改革开放之初，虽多次来渝，但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以及重庆作家们工作和居住的中山三路的重庆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纪念地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桂园、《新华日报》旧址。当然，还有从发轫到崛起到盛极而衰的巴人（或僰人）留在三峡中的悲壮历史与足迹……1980年我在宜昌访问刚刚出道的周克芹以后，决定到重庆，访问重庆的文艺界。此后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重庆对我来说，是一块巨大的磁石。”

我一直在期待探寻和认识一个巴渝文化的重庆。说老实话，以往的多次重庆之旅，至少在文学界，我并没有寻觅到巴渝文化的踪影。

多年来我没有放弃捕捉每一个可能了解巴渝文化的机会。有一次，我从成都经重庆回北京，动身前，老家沙汀特别关照并打電話给万县的青年作者，在我乘坐的轮船停泊万县的几个小时里，与他们在船上会面并座谈，他们还陪我上岸在涪江集市上流连参观，使我这个过去仅在何其芳的散文中略知一点点万县地方文化的文学编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巴东土著和巴东文化。而正是这些常年生活在高山深峡中、一向与山民夫休戚与共的巴东作者和文化干部，给我补上了巴渝文化这一课。

后来，我的工作重点从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研究，在成都举行的四川省民间文学普查工作会议上，我提议要重视对民俗礼仪歌谣的搜集。巴中县（今巴州区）文化馆的朱仕珍立即将他们搜集编辑的一本油印的《巴山民俗歌谣选》送给我。我从这些民俗歌谣诗文中了解了地处巴渝文化腹地的巴中人的日常生活和活态的巴渝文化。我不无感慨地说：“巴中文化馆的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今天才开始提出来，他们却已把书稿都编好了，并准备出版发行了。”

1988年，这本书油印的书稿出版了，在那时的川东北，也就是现在的巴东一带，一下子就发行了4万册！这本书里第一次选入了过去出版的文籍图书中没有入选过的建房仪式歌谣、春官歌谣、祝寿仪式歌谣、婚嫁仪式歌谣、丧葬仪式歌谣、民间工匠歌谣及其他民俗歌谣等七类民谣，是一本多么难得的地域文学和民俗文学选本呀！巴东一带农村里从事民俗礼仪活动的民间传人，看到这些记录和描述了当地民俗礼仪的书能够公开出版，意识到民俗礼仪活动是被允许的了。不会再受批判了，于是，他们又重新拾起传承这类民俗礼仪的活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又陆续出版了《丧葬礼仪歌谣选》和《工匠民俗歌谣》，

将川东北流行的“出堂三献”和“对灵三献”仪式，以及与这些仪式相伴而生的诗歌、赞语、吉利、祝词，悉数录之成册，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生活中会在不经意间悄然消失的乡土文学读物，而且给民间的土、石、木、知客事、赞礼生、押礼先生、春官等诸类匠人提供了一本民间知识手册。

古代巴人生活过的巴渝之地，一向被视为“淫祀”的地区。学界有人认为《山海经》中的《大荒经》是巴国人的作品。我的老伴多年来研究《山海经》古图和中国古代图文叙事传统，时任重庆大型文学期刊《红岩》主编的张胜泽老友从重庆图书馆为她复制了清咸丰五年（1855）四川顺庆海清楼成或因刻本《山海经图广注》中的一些古图，使她了解了清代巴渝画家是怎样看待和形象解析《山海经》的实证视觉材料。这些古图也为我对巴渝文化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巴渝文化本与儒家文化无缘，应该说是一种独立的地域文化。可惜，多年来愈来愈强的文化趋同化思潮，却使巴渝文化的独特性几近销蚀殆尽了。

深藏在渝东南边陲武陵山区的酉阳，因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而名闻遐迩。说不定那里的文化就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现在想来，总为自己没到过酉阳而追悔莫及。段先生说：巴渝（酉阳）的文化“及怪及戏，无侵于儒”。也就是说，巴渝文化及其传统是历史久远的，而是一种与儒家文化及其传统无关的独立的文化。2010年酉阳县政府将“酉阳古歌”申报参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作为评审组成员，我为这种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文化的现身感到振奋，曾毅然地为它投上了一票。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古文化传统永远被埋没下去。“酉阳古歌”的入选，以其独立性与独特性在文化多样性的中华文化家族中增添了一支艳丽的奇葩。

对我而言，“亚洲文化论坛”是一个良机，借机就亚洲携手合作保护东方文化传统，包括巴渝古老文化传统问题，略陈己见，也算是对提高国人的文化自觉进一言吧。

■ 纪念

诗纪老友何浩中

□ 聂鑫森

与年长我几岁的老友何浩中，同住一城，交谊40载，可谓情深意笃。特别是彼此退隐后，聚首之时多矣，或采风作画于旅途，或把酒谈笑于席间，或围炉品茗于雅室。他心慈、面善、待人宽厚，在朋辈中颇具师长风范。他自幼及老，于国画一途，毫发无缺，以人物画誉于世。达摩、如来、济公、罗汉、老子、庄子，以及现代的政治家、军事家、画家、学者、工农兵英雄模范，无不在他笔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我曾为他写过三首旧体诗，以评述他的人品、画艺，记录我们之间的友情。前两首曾面呈于他，乞请斧正；后一首作于他鹤归道山之后，九泉之下的他可否能听到我的哀吟？

浩中辞世于辛卯年仲夏。数日前，我曾坐于他的病榻边探视。病厄已让他容颜消瘦，说话时断时续。浩中七十有二，思想和艺术已臻佳境，天岂不怜其才？谁料这次的会面，竟成最后的诀别！

从浩中的追悼会上归来，独坐书斋，潸然泪下，写下《悼老友何浩中》一诗：

施丹波墨徵微斑，谁料星沉酷暑天！病鹤伶床声断续，深杯忆昔泪酸成。济公挥扇清涼界，老子骑牛函谷关。前世今生君永寿，侍神写照圣贤间。

2003年1月，施杰荣受平江“东山古寺”本智方丈所托，邀请株洲的几位书画家，为该寺的各处创作书画以便悬挂。白天我们在讲经堂支案挥毫，夜晚于“方丈楼”品茗、下榻。那是两天极为愉悦、安详的日子，濡墨调色之隙，听经声梵呗，宛然世外。浩中以八尺宣纸作《十八罗汉图》，腕底生风，笔走龙蛇，画格颇见先贤顾恺之气韵。他虽为俗世的“槛内人”，却能传得出微妙的禅思佛意，令人击节。

归株后，我曾作《观何浩中兄作八尺宣十八罗汉图》一诗为赠：

笔走龙蛇势万钧，金刚罗汉活生生。细描眉眼多情面，乱抹衣衫不坏身。

槛内尽传佛子意，画中已见恺之风。名山名寺留名作，雾散云开日正升。

最后一句写的是实景。第二天上午，一直大雾笼罩，当浩中继昨日之劳，完成全画钤印时，忽然云开日出，天地亮堂。伟钊笑着说：“这是十八罗汉酬谢何公造像之功。”

2009年秋，浩中觉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竟是胃癌晚期，必须施行大切开手术。手术很成功，浩公平素身体硬朗，因而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我与杰荣、海堤、之蓁诸友，前去看望。浩中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遗憾地说：“胃全切除了，遵医嘱，要忌食，要禁烟、酒。”大家安慰他：“养息几年，身体恢复了，我们再把酒临风。你还有许多画要画，还有许多好风景要看，期颐（百岁）之寿是没有问题的！”

这年的春节之前，我用扇面纸书写了一首七律《贺何公手术后康复》，代贺年片呈之贺吉：

寿鹤老梅笑倍馨，此生佛画最堪珍。咀嚼噙古何用胃？审世知人但有心。晚底春风吹暖煦，楼头晓日镀金窗。丹青已许期颐约，犹盼深杯酒共斟。

嗟夫！天不假年，想不到数月后，浩中骤然辞世。再不能看他运笔作画了，再不能与他共访山水了，再不能和他对酒当歌了。正如海堤兄之挽诗所言：“平生故旧伤零落，忍对悲风泪雨斜”。

但他依旧活着，活在亲人与师友的回忆中，活在他留存于世的画图中，活在他的老师、白石弟子李立教授挥泪写下的“后世楷模”的条幅中……

■ 艺文空间

看过“辛亥百年——著名画家李晨邮票设计作品展”的样本，内心深处有一种惊讶。李晨用一支笔为一段历史写真、存照，让已经远去百年的一批批人物、一幕幕场景再现于眼前。让人既感叹作者对陈旧记忆的独特发现，又感叹他手中一支铅笔对生活的真实再现。

追踪他的创作，我发现作者的创作条件在现今社会可算是简陋之简陋了。画案上没有调色盘和成堆的颜料，他所持有的仅是一支笔，但笔下走出的人物、事物和场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凭感觉，我把李晨的艺术表现和周韶华老师所持的“一以治万，万物归一”的艺术创作理念融为一体。他是一个以简约营造复杂和深沉的高手。他的创作最能让观众为之震撼的地方就在于其画作无色彩，而又呈现出画面特有的丰富多彩。他的艺术魅力在于：只用一支铅笔铺就底色，然后借助光的强弱调制观众所需的各种非颜色性艺术表达，给你本真的生活和真实的人。

写到这里我要说，为李晨的画展写一段话，起先只是受朋友之命，不得不为之。但看完其画展样本后，一种被折服的冲动就支配我的笔格外自觉，想替他写出我和读者的心声。

看李晨的画作，就像在翻看家存或史存的一张张老照片。他的作品秉持了一以贯之的老实、本真和归真。没有哗众取宠的浮光掠影，没有上天入地、潇洒无羁的浪漫想象，不靠夸张、变形、象征、隐喻、抽象去营造视觉或感观的刺激。

他的画就是一种写真。他最信赖又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是一支铅笔，他最随心所欲的颜料是光，在黑与白的比对中给了我们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的人物形象和生活集锦。

李晨的画是可以让人肃然起敬的。这种力量既来自于他向我们展示的人物、场景、画面，也来自于作者本身的严谨、认真和恪守。正因此，他的画作庄严、深邃、含蓄、准确，一望而知其所言，具有透视生活的张力，可以让观众由小见大，通过一个人物、一座建筑、一段生活的断面，联想到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种渐去渐远的社会风情。

“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画家艺术成就的穷极力，既取决于他自身的才华，更取决于他对于艺术方式的选择和为之所投的毕生精力。实事求是地说，李晨不是一个凭借灵感、才情和想象力作画的画家。他更多是秉持一种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的精神，握紧一杆笔，向现实谋取一份人人拥有的光，甘于在寂寞中苦熬，熬出一种属于生活和大家认定的不甘寂寞。这就是李晨。看他的画作，会感觉突然和一段生动的历史、一群鲜活的人物走近了。但你站在那里凝望又会忘我，体味到一种久违的、日渐生疏的精妙表情。

这时，画家一丝不苟的艺术创作的品格正在浸染你，你会豁然明白：一个画家之所以能在结构极简、毫无色彩装饰的状态下，落笔精准、画龙点睛，给予我们视觉和心灵以巨大冲击，那是因为他在用心血调色，所以画作闯入视觉就力透灵魂。

